

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

考古报告卷

上卷

丛书总主编 迟文杰

本分卷主编 李 莹

编纂机构 新疆天山天池管理委员会

学术支持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 考古报告卷

上卷

丛书总主编 迟文杰

本分卷主编 李莹

编纂机构 新疆天山天池管理委员会

学术支持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 考古报告卷/新疆天山天池
管理委员会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633—8290—3

I. 西… II. 新… III. ①神话—人物形象—研究—中国
②考古学文化—研究报告—青海省 IV. B932.2 K872.4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285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 bbtpress. 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71.75 字数:1102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500 定价:26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远古人们结群而居，在集体劳动和共同生活中，创造了原始工具、记事符号、图画文字、原始音乐和舞蹈，同时也产生了原始神话。神话出现于原始氏族社会，并伴随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变化和发展。早在原始人群和血缘氏族时期，人们便已开始了早期文化的创造。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抗争自然的能力有所增强，活动范围也日渐扩大。考古发现一再证明，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中国西北高原、华北平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都有远古人类活动的遗迹。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则进入母系氏族社会高度发展的阶段，在中国黄河、长江流域，这种以母系血统维系的母系氏族更发展到全盛时期。中国古代神话中因而诞生了不少女性神话人物，如西王母、女娲、羲和等。母系氏族社会，妇女不仅在生产上起主要作用，而且还是原始聚落中胞族的轴心。她们常常被神化成人类及万物的创造者。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位神祇，其信仰至晚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汉代是西王母信仰的盛期，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较大范围内和较长时间里流行、具有民间宗教崇拜性质并具有常人形态的神，故又被海外学者称为“中国第一神”。而学术界认为西王母是中国西部距今三千多年前后，曾经广泛存在的母系氏族社会的代表性人物。

西王母：根据《山海经》记载，这位传说中的女神职司灾疫和刑罚，亦称

为金母、瑶池金母、王母娘娘，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住在昆仑之丘的绝顶之上，昆仑之丘不仅是特指一个地点，而应当是泛指相对中原而言的中国西部广大的区域。有叫做踞鸟（青鸟）的三足巨型猛禽，为其服役，又称三足鸟。

三足鸟：古代的太阳精灵，也被看作太阳运行的使者。中国古代传说太阳中居住着三足鸟，人们敬仰太阳，三足鸟也被作为祥瑞的象征来崇拜。1971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中出土一幅彩绘帛画，右上方是一轮红色的太阳，太阳中间有一只三趾的神鸟。在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40年的《淮南子》中，就有“日中有踞鸟”的记载。据说由于三足鸟一共有十只，不停地在天空中运转，导致地上遭受旱灾和灼热的煎熬。尧帝命令后羿将所有三足鸟射杀，结果后羿射落九只留下一只，从此太阳只有一个并且在傍晚落下。而三足鸟是服侍西王母的精灵，是专门为西王母觅寻食物的神鸟。

西王母与长生：传说西王母所在之处有“生命之树”，每三千年便长出代表长生不老的仙果。仙果在中国神话中的意义相当于西方的神奇苹果，是令众神得以长生的“神之食物”和“不死之神肴”（ambrosia），在波斯它被称为 haoma，在埃及被称为 sa；长生不老仙果中的蟠桃则演化成了西王母大宴众仙的专享圣果。它的本质是诸多文化传说中始祖女神创造万物的神圣之血——生命之源。西王母既掌握着死，又掌握着生。仅此两点，便可见西王母在上古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所以，有学者说：“在中国古神话中历来存在着一个辩证的观念：生神与死神，创造生命之神与刑杀生命之死神乃是同一位神。”

远古人们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神话故事，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精神艺术创作。神话并非现实生活的准确反映，而是由于远古时代自身能力低下，不能够科学地解释宇宙世界、自然现象和原始社会文化生活的起源和变化，仅以简单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借助想象把自然力和客观世界拟人化思考的结果。所以神话观念具有超越语言甚至文化的性质，上古中国的许多神话人物而今都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文化中的传说与宗教偶像。西王母崇拜就目前研究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也已不限于个别地域或个别民族，无疑已经具有跨地域跨族群的文化影响。首先，因为她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代表着繁殖与生长；其次，她还是西方仙境的领袖，是最大的神，

她是中国文化中佛教传入之前最重要的神与偶像,信众广布海内外;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道教形成后对西王母神话的流传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源于老庄哲学尊崇女性的思想引导,西王母由母系部族首领演变成仙,进而又成为道教最尊崇的众女仙之宗。西王母不仅能度人成仙得道,而且掌长生不死之药,握生杀长寿大权,所以,又产生了嫦娥偷长生不死之药成仙奔月的千古神话。西王母受到了渴望长生不死和成仙得道的汉代民间的狂热崇拜,她是护佑平民百姓的金母,又是汉武帝求仙不死的神灵。她是道教尊奉的元始天尊,成为汉画像石中有许多羽人侍者相伴的画像主题;也是称作扶桑大帝的东王公的对偶神,更是变成了玉皇大帝之后,慈善的王母娘娘,得到更加广泛的信奉。

新疆天山天池作为西王母神话传说中的夏宫和瑶池所在地,由古至今,以西王母文化为主体脉络生成、传承、发扬,形成了天山天池独特的道教文化。

汉代道教产生后,西王母文化与道教文化融合互生,在天山天池衍生了许多道教故事。历史典籍除《山海经》外,在《穆天子传》、《神异经》、《汉武帝内传》、《淮南子·览冥训》、《枕中书》、《西王母传》、《搜神记》等书中都有记载。而《穆天子传》是众多记载西王母文化的代表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穆王在与西王母惜别时的对歌中提出“和治诸夏”的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建设人类理想社会的思想精髓。

西王母瑶池会周穆王的故事,经后世的代代相传,特别是经天山天池周边地区本土文化的演绎,已形成内容十分丰富、人物形象十分鲜明、情节十分动人的系列故事,如《西王母瑶池盛宴周穆王》、《周穆王八骏赴瑶池》、《瑶池缘》、《玄女施法》、《西王母降妖》等,以及诸多民间世俗传说,如《王母私访》、《三度嫦娥》、《消灾门》、《夫妻树》、《醉仙林》、《蟠桃园》、《东方朔偷桃》等。

在道教多神论的影响下,本土居民还把天池的异石奇木都与西王母相联系,产生了大量的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故事和建筑。如说天池为西王母所造,既是她的沐浴处,又是她的梳妆镜;说天池北岸上的那棵老榆树,则是她的头簪变成的一枚定海神针等。

唐代,天池道教文化有了新的发展,许多文人墨客受到西王母神话、传说等文化影响,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增加了天池西王母文化的

文学底蕴。在这一文化流变中以唐代大诗人李白为最,在其《清平调》中写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诗中提到了西王母神话中的“群玉山”、“瑶台”。《天马歌》中更有“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再次提及西王母神话中的核心内容——“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穆天子传》)。李商隐的《瑶池》“瑶池阿母倚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的佳句,则广为流传,为西王母文化增添了千古帝王爱情故事的色彩。清代新疆成为清政府流放地,大批谪遣官员、文人来到这里,留下了丰富的诗歌、行旅笔记,使西王母文化呈现出多彩多姿的形态。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重视,经文化工作者搜集、挖掘,整理成《民间故事集成》、《瑶池与西王母的传说》、《天池传说与王母神话》(故事书籍)、《周穆王西游记》(连环画册)、《瑶池史画》(剧本)等。2007年2月,西王母文化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以西王母文化为主体的道教文化作为天山天池的主流文化,其文化发生的源头、文化绵延展扩的时空维度、文化的个性特质、文化对待人生的态度,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都有一定的分量。新疆天山天池作为中国社会各界公认的西王母仙居地之一,以弘扬西王母文化为己任,挖掘、整理、传承西王母文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也是做一大功德。

近年来,西王母文化受到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西王母神话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王母娘娘的记载有很多,反映的是中国前期的历史。时间跨度从远古直至两汉;地域覆盖从华夏故土放射到周边四夷、域外各国。两汉文化是佛教未全面影响中国以前的文化,是集中华固有文化之大成者,内容庞杂,记录丰富,被视为一部形象的先秦文化和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作为对中华固有文化的寻根,西王母研究是一种直捷的方式和可靠的形式。正因为如此,西王母不仅吸引了文物考古界、艺术界,也吸引了包括历史、哲学、宗教、民俗、民族、天文、冶金、建筑、酿造、纺织等学科和专业的注意。今天的西王母研究实际上已朝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发展和朝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就西王母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出现类似“敦煌学”的“西王母学”,本是情理中事。

2. 西王母在道教中地位极为特殊,全名为白玉龟台九灵太真金母元君、白玉龟台九凤太真西王母或太灵九光龟台金母元君,为女仙之宗,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得道登仙者,都隶属于西王母管辖。此外,西王母和东王公又是道气阴阳之父母,共理二气,育养天地,陶钧万物。

3. 西王母信仰在古代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研究也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如何开展西王母文化研究和弘扬的新局面,是今天西王母文化研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目前,国内已基本形成一支西王母文化研究队伍,不过人员庞杂,研究内容多停留在比附、揣测和为世俗利益服务的初步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规模和力度的加大,大量与西王母有关的出土文物不断涌现,新材料的出现不仅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也对研究的深度和范围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

国内外学术界以及社会其他相关领域对西王母的关注与研究虽说由来已久,但是对于相关传说的收集、整理,古代文献记载的梳理,考古资料的刊布与汇集整理,人文科学各个角度的深入研究可以说工作才刚刚起步,许多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新疆天池管委会深感有责任为西王母文化的研究与弘扬略尽绵薄之力。我们初步的考虑便是筹措出版《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大型系列丛书,以及进行与之相关的社会组织与文化弘扬工作。

丛书目的在于系统介绍国内外学术界和相关文学、艺术领域迄今所有关于西王母记述与研究成果,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且现今仍有重大社会、学术价值的重要资料与著作。我们将从基础资料与研究成果的汇集和刊布着手做起,逐步涉及并涵盖西王母文化的各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之中不到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会以续编或补遗等形式加以完善,当然也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帮助,一同为研究和弘扬西王母文化尽力,以此为中华文化推陈出新和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迟文杰

2007年10月18日

主编的话

做研究写文章最重要的就是掌握第一手资料，西王母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应从哪里得到？目前看来只有考古报告。因而有关西王母的考古报告资料对西王母研究而言必不可少，这正是我们汇编《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考古报告卷》的基本出发点。

当然如何读考古报告、怎样使用考古报告，也非常重要。这是一条收集大量、可靠、有用材料，再进一步研究，并从中得到所需内容、提出有建设性观点的必由之路。

实际上，并不是人人都能参与到发掘现场，所以对于我来说，发掘报告就是我能掌握到的第一手资料。一篇好的发掘报告，能够通过简洁、形象且严谨的语言，真实地反映出所发现墓葬的所有细节，以供后续研究学者使用和引用。

虽然老师们总是教导要好好用报告，但真正意义上使用报告，是通过这次收集成书。在我所收集的这些报告资料中，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刊登在《考古》、《文物》等这类专业报刊上，另一类是已成书的报告集。^①

^① 由于部分文章发表年代久远或作者单位变动，尚有部分作者未能及时联系上。请直接写信给新疆天山天池管理委员会宣教部，以便及时获取稿酬和样书。

做学问要严谨,不管在哪一个环节,稍有懈怠便会“千里之堤,溃于蝼蚁之穴”。所以所收的每篇报告,均经过认真研读,是通过筛选而出的真正符合条件的报告。其实,涉及西王母的墓葬资料很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被收录,例如有些墓葬考古发掘报告资料不全,或者已发表的报告中资料有误。

工作中,我也因其他课题所需去收集资料,但均比不上此次所收资料之庞杂。庞杂,体现在数量和载体种类的繁多,还有内容的复杂。西王母,因其可以引导死者荣登仙界,能满足当时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无限希冀,所以其形象在墓葬中被广泛地描绘。而其载体形式有画像砖、画像石、画像石棺、摇钱树(树、座)、陶灯、铜镜、陶俑、壁画、铜牌饰、石碑刻文、玉座屏等,可见其影响力之大,非其他宗教偶像可比。而西王母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如何重要,在此我就不赘述了。

根据目前收录的考古发掘报告,在此简略地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西王母主题的表现模式。西王母在画像中是很少单独出现的,她有一套自己的表现模式,即配以东王公、三足乌、九尾狐、玉兔、蟾蜍、伏羲、女娲等,全部或者有选择的表现在一个画面中,组成一个体系。在画像中,西王母体系的表现有一个很明显的发展过程,即“简—繁—滥”。随着西王母信仰的发展,其表现也愈加丰富,由简单到复杂,最后发展到繁冗。

其次,按照时空关系。西王母形象在汉代墓葬中出现最广,尤其东汉时期,且大多分布在四川、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安徽、甘肃、云南、湖北等地区,以画像石居多。据现有资料可以发现,在表现西王母形象上,我国主要有四大地区极具特色:四川、河南、山东和陕西晋西北。

(1)四川:是各地区中,载体种类最多、最具特色的区域,并以东汉时期为主。西王母形象多为正面,常配有龙虎座、华盖、羽翼和方形坐垫等事物,但鲜见与东王公配对出现。多表现在画像砖与画像石棺上:画像砖上,其形象更为丰富,有九尾狐、玉兔、蟾蜍、三足乌等伴其左右,其中玉兔多呈持灵芝状,而非捣药,这可能是因为前期未形成固定模式,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玉兔捣药才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出现在画面中。而画像石棺就不如画像石一般有一定的特点和传统,它没有固定的样式图案。在四川还出土了极具特色的摇钱树、铜镜、陶灯、陶俑等,且有些是四川地区所特有的。

(2)河南:西王母形象多出现在西汉后期至东汉初的画像石和画像砖

上,其形象多为四分之三侧面,同四川一样鲜见东王公配对出现。

(3)山东:西王母以正面为主,形象多表现在画像石上。东汉早期多单独出现,东汉后期与东王公成对出现。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在山东出现了很多地方流派样式,例如嘉祥样式、滕县样式等。

(4)陕西晋西北:西王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并能清楚地从画像中发现其由正面像向四分之三侧面像的过渡发展,少有左右对称的正面像。并且西王母和东王公在画像中出现的位置模式形成了一种程式化,多出现在门两侧,以米脂和绥德的画像砖最具特点。

载体方面通常使用以下三种形式,即“神画”、铜镜和摇钱树。

(1)“神画”,即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以画面的形式存在的物化的实物资料,应该至少包括了壁画、帛画、砖画、雕画等艺术形式。用绘画的方式来表现西王母这个形象,应该是所有表现形式中形象最生动且最灵活的一种方式。由于材料的因素,“神画”可以更好地表现复杂、细致的场面,这是其他载体所不能企及的。

绘画,通常能够更清晰地传达某种信息。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研究它们,例如考古学、美术史甚至社会学,均能得到不同的信息。比如艺术创作的方式与发展、人们对于审美的变化、如何表达主题、当时的宗教信仰……由于汉代西王母宗教信仰的盛行,所以在墓葬棺槨等上的画面中,西王母处于一个统治的地位,对于我们观赏者来说,画面中的墓主人反而处在了次要地位。但是到了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的混乱,人们从前建立的思想体系被打破,所以导致宗教因素对与墓葬壁画的影响在减弱。魏晋时,人们思想上对死后世界的认知有所进步,社会盛行举孝廉,所以墓主人便成了画面的绝对主角,而宗教因素被淡化了,观赏者所看到的画面内容与汉代相比发生了根本上的改变。由此可以看出,墓葬画像的内容、表现形制和当时所处社会的形态,三者是不能被割裂开的,应该全面结合地研究。

(2)铜镜。据已有材料来看,铜镜虽然在数量上没有“神画”多,但与“神画”相比,其艺术价值毫不逊色。并且,与其他载体相较,铜镜自身有一十分重要的特点,即它是唯一一种在现世生活中也使用的器物。汉代的铜镜,在样式上除了继续沿用战国镜外,最流行的铜镜有蟠螭纹镜、蟠虺纹镜、章草纹镜、星云镜、云雷连弧纹镜、鸟兽纹规矩镜、重列式神兽镜、连弧纹铭文镜、

重圈铭文镜、四乳禽兽纹镜、多乳禽兽纹镜、变形四叶镜、神兽镜、画像镜、龙虎纹镜、日光连弧镜、四乳神镜、七乳四神禽兽纹镜等,种类之多十分惊人。而西王母图像则主要出现在规矩镜、画像镜和神兽镜这三种类型的汉代铜镜上,并各具特色。在本书所录报告中,以神兽镜和画像镜居多,且多为东汉中期至末期。

由于铜镜不仅是陪葬品,也是生活用品,所以它较其他墓葬用品易于流动,所以它的样式和风格相对统一,没有太大的地区差异(关于铜镜方面的发掘简报,《考古报告卷》所录不多;关于西王母铜镜部分,在《图像资料卷》中体现)。

(3)摇钱树,是东汉时期,四川地区表现西王母主题所特有的一种墓葬用具。因该器物上装饰大量方孔圆钱而被学术界命名为“摇钱树”,它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两部分:陶制或者石雕的基座(摇钱树座)和插于树座的青铜树。东汉末至三国时期,摇钱树的数量开始锐减,直至西晋时期彻底消失。通常有摇钱树出土的墓葬多为大中型墓葬,表示该器物在当时是地位和权势的象征,其使用者应为富有家族。

摇钱树本身是民间祈求财富的表现,与西王母信仰相结合后,它的意义变得丰富起来,开始具有“引魂升天”的意义。在钱树上,西王母多被安置在其青铜树顶,而三足乌、九尾狐、玉兔、蟾蜍等多在树枝,配以铜钱树叶,这使得摇钱树开始成为引导死者灵魂进入死后仙界的一个象征。随着西王母神性的不断丰富,有些学者认为摇钱树还具有庇护死者家庭子孙的作用。

摇钱树比其他墓葬用具更具特色,因为它形象地表现了求财、祈福、保佑和求仙的思想,并且运用了独特的艺术语言,形象且生动。它是否也如铜镜一般使用于现世生活中,或者作为西王母宗教祭祀中的一个神器?

在这一《考古报告卷》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刘一曼、巫新华,中国国家博物馆孔祥星等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们于百忙之中就报告资料的搜集和甄选提出宝贵意见。另外,出版编辑过程中还得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细致周到的帮助。在此,诚挚地向所有帮助过我的师友表达衷心的感谢。

李莹

2008年11月

目 录

- 0001 总 序/迟文杰
- 0007 主编的话/李 莹
- 0001 四川郫县东汉砖墓的石棺画像/四川省博物馆 郫县文化馆
- 0014 宜宾地区出土汉代画像石棺/崔 陈
- 0023 四川合江县东汉砖室墓清理简报/谢 荔 徐利红
- 0028 四川乐山市沱沟嘴东汉崖墓清理简报/乐山市崖墓博物馆
- 0040 合江张家沟 2 号崖墓画像石棺发掘简报/王庭福 李一洪
- 0044 四川新繁清白乡东汉画像砖墓清理简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 0048 西昌东汉、魏晋时期砖室墓葬调查/黄承宗
- 0059 彭山县岩墓发现的画像砖/帅希彭
- 0061 四川彭县等地新收集到一批画像砖/四川省博物馆

- 0068 新都县发现汉代纪年砖画像砖墓/张德全
- 0075 四川彭山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帅希彭
- 0084 彭山近年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帅希彭
- 0090 大邑县董场乡三国画像砖墓/大邑县文化局
- 0109 四川出土的十一具汉代画像石棺图释/高文 高成英
- 0122 记彭山出土的东汉铜摇钱树/沈仲常 李显文
- 0126 四川西昌高草出土汉代“摇钱树”残片/刘世旭
- 0129 四川绵阳河边东汉崖墓/何志国
- 0140 四川凉山西昌发现东汉、蜀汉墓/凉山州博物馆
- 0155 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何志国
- 0170 新津县出土东汉摇钱树/新津县文管所
- 0172 四川省出土的汉魏摇钱树/何志国
- 0184 四川三台县发现东汉墓/三台县文化馆
- 0187 四川宜宾出土西王母陶俑/金沙 前宜 保生
- 0188 乐山市中区高笋田崖墓清理简报/胡学元
- 0192 四川乐山市中区大湾嘴崖墓清理简报/四川乐山市文管所
- 0207 三台新德乡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景竹友
- 0213 四川荣经东汉石棺画像/李晓鸣
- 0215 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何志国
- 0226 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
/重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
- 0239 重庆巫山麦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报告
/重庆市文化局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巫山县文物管理所
- 0265 郑州新通桥汉代画像空心砖墓/郑州市博物馆

- 0277 新野樊集汉画像砖墓/河南省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
- 0315 打虎亭 2 号墓(M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 0476 郑州市南关外汉代画像空心砖墓/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0500 洛阳新发现西汉画像砖/史家珍 李 娟
- 0509 河南南阳县英庄汉画像石墓/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 南阳县文化馆
- 0526 偃师县南蔡庄乡汉肥致墓发掘简报/河南省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 0535 河南淇县发现一面东汉画像铜镜/曹桂岑 耿青岩
- 0536 固始县发现东汉画像镜/詹汉清
- 0537 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洛阳博物馆
- 0553 河北定县 43 号汉墓发掘简报/定县博物馆
- 0569 米脂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陕西省博物馆 陕西省文管会
- 0576 陕西绥德县延家岔东汉画像石墓/戴应新 李仲煊
- 0584 陕西绥德汉画像石墓/绥德县博物馆
- 0591 神木大保当(节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 0761 米脂县官庄村东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榆林市文管会 米脂县博物馆
- 0771 绥德县辛店乡郝家沟村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
/榆林市文管会 绥德县博物馆
- 0780 陕西永寿孟村发现隋代铜镜/朱捷元
- 0782 山西离石马茂庄东汉画像石墓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吕梁地区文物工作室 离石县文物管理所
- 0808 山西离石再次发现东汉画像石墓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吕梁地区文物管理处 离石县文物管理所
- 0827 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节选)
/南京博物院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 文化部文物管理局

- 0888 山东嘉祥宋山发现汉画像石/嘉祥县武氏祠文管所
- 0894 山东嘉祥宋山 1980 年出土的汉画像石
/济宁地区文物组 嘉祥县文管所
- 0907 山东微山县汉代画像石调查报告/王思礼 赖 非 丁 冲 万 良
- 0922 济宁市博物馆近年拣选的古代铜镜/殷凤华
- 0926 山东邹城发现两件汉代铜镜/程 明
- 0928 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像石墓/南京博物院
- 0947 江苏沛县栖山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徐州市博物馆 沛县文化馆
- 0955 徐州发现东汉元和三年画像石/徐州博物馆
- 0967 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王步毅
- 1003 甘肃高台骆驼城画像砖墓调查
/张掖地区文物管理办公室 高台县博物馆
- 1013 云南宜良县孙家山火葬墓发掘简报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 1037 湖北蕲春枫树林东汉墓/湖北京九铁路考古队 黄冈市博物馆
- 1094 鄂城六朝墓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鄂州市博物馆
- 1126 湖南长沙砚瓦池古墓的清理/李正光 张鑫如

四川郫县东汉砖墓的石棺画像

四川省博物馆 郫县文化馆

1973年4月,四川郫县新胜公社(原名竹瓦铺)二大队第三生产队的社员在取土时,发现了一座东汉砖室墓,依发现次序的先后,称为2号墓(1972年发现的一座称为1号墓,简报见《文物》1975年8期,李复华:《郫县出土东汉画像石棺图像略说》),四川省博物馆闻讯后,即派员进行了清理。

该墓方向为 235° ,整个墓的建筑由墓门、墓道、墓室组成,全长10.48米、宽2.46米、高2.02米,全部用花砖建筑,砖长0.34米、宽0.22米、厚0.06米,花纹均在砖的侧面,纹饰以几何纹为主,或配以“联璧”、“瑞草”、“卷云”等十三种纹饰。内有石棺三具。由于该墓早年被盗,墓中积满了淤土,随葬品仅存铜的摇钱树残片以及残的陶器,如罐、钵、琴、鸡鸭、房屋等。比较完整的是石俑、石案、石田模型及残石柜等。石俑高0.9米,着长裳,左手执刀和盾。另一件石俑(缺头),残高0.55米,着长裳,应为侍者(图一:2)。石案长1.36米、厚0.07米、足高0.1米、通高0.17米,缺一角(图一:4)。石田长0.68米、宽0.62米、厚0.13米,内有田三块(图一:1)。残石柜长0.65米、宽0.59米、高0.48米(图一:3)。

1974年3月,在距2号墓约1米处,又发现了东汉砖墓一座,内有石棺两具。该墓由于早年被盗,遭到严重破坏,除幸存两具已残的画像石棺外,墓室结构已不能复原,随葬品亦已无存。